

■ 陳 芳 明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曾任政治大學、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民主民主進步黨文宣部主任。

專業領域為台灣歷史、台灣文學。

代表著作有《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等。







「歷史記憶是文化的基礎，我們應該尊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然而「在「轉型正義」成為社會顯學後，陳芳明感嘆：「這個社會卻有一部分人的歷史記憶被粗暴地對待，」民進黨將轉型正義操作成清算式的批判，「讓台灣陷入無止盡的對立與不安中。」

陳芳明說，政治上的動盪，「對文化形成很大的傷害。」他主持的「台灣文學研究所」願意跟「中國文學研究所」保持良好互動，「就引來一些人期期以為不可的批評，」陳芳明說，一些自認本土的人說，不可以跟中國文學走得那麼近，台灣文學要守住自己的資源；陳芳明說這種「保護」其實是一種「自我設限」，更是一種「傷害」，他感嘆：「經過五〇年在台灣的教育和在地經驗的累積，即使是唐詩宋詞，我們也有了自己的詮釋，中國文學可以是台灣文學的養分，」就像很多外省人的經驗也是台灣經驗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排斥、排除？」

陳芳明認為，文化應該是一種加法，廣納百川方成其大，「但是台灣卻一直在做減法，各個領域都是如此。」這裡也減，那裡也減，「結果搞得二十一世紀的前八年，台灣全然給浪費掉了，因為台灣什麼都沒有做好。」

陳芳明說，看看別的國家全都在衝刺，只有台灣因為一個沒有歷史觀、戀棧權位、



缺乏同理心的政治領導者，把台灣鎖在虛妄、偏狹的本土論述裡，「寸難難行」。一路從過黨外時期走來的陳芳明看著民進黨為著「一個人」墮落至此，不只感到心痛，更滿懷憂慮：「台灣已經輸在起跑點上了，」為了這種無聊無情的鬥內耗，「台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陳芳明問，還要這樣下去多久？

這股鬱悶和擔憂，不只陳芳明懸繫心中。他說，很多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者，一開始都是跟「黨外運動」匯流而行的，例如環保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等等，當時大家的目標一致，就是要對付國黨這隻「大怪獸」；隨著民進黨執政，很多人「卻發現本來以為純粹是為理想打拚的人，其實骨子裡只是為某種意識型態服務，甚至抵抗不了權力的吸引，跟過去的威權有什麼不同？」可以說，民進黨雖然完成了本土執政的歷史性任務，卻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窄化了本土，台灣的活力和創意「被偏執虛妄的本土論述給框架住，」很多知識分子和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因而陷入了巨大的失落。

許多的情緒正不斷膨脹著，需要一個出口，「在這次的陽明山會議中，我看到壓抑正在釋放，」陳芳明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表示大家都還沒有放棄，理想還在，」他期望愈來愈多知識分子願意站出來，「一起為更開放的台灣再努力。」

# 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

——  
陳芳明

## 轉型正義的基礎

轉型正義的口號變成一種政治風尚時，很有可能為台灣的族群文化帶來傷害，也可能對台灣的歷史發展造成扭曲。經歷過殖民體制與戒嚴體制的台灣社會，在整個二十世紀的過程中誠然遭受到高壓權力的支配。這種絕對的權力支配，稱之為帝國也好，或稱之為獨裁也好，確實對這個島上住民的心靈構築了長期的囚禁。在跨世紀的政權更迭中，台灣社會第一次見證了民主的曙光，也迎接了相當程度的精神解放。

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四年陳水扁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幾乎所有住民都對綠色執政投以極高的期待與信心。對照過去威權時期的領導者，陳水扁被視為一種歷史解放的象徵。只因為他是從民間崛起，而且是經過人民普選而贏得最高權力。但是，民主政府的誕生，並不必然意味民主政治的到來。陳水扁的第一個任期幾乎可說乏善可陳。到了



二〇〇四年之後展開的第二個任期，陳水扁政府把整個施政方針導入前所未有的統獨對抗。為了使這種對抗策略得到合理化，陳水扁在追求本土化與主體性的口號之外，開始大量使用轉型正義的主張。

在二〇〇五年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陳水扁政府有任何隻字片語提到轉型正義，在二〇〇六年爆發國務機要費案件之後，轉型正義卻突然成為綠色執政的習慣用語。究其原因，在於七一五學者提出嚴正批評，要求陳水扁必須為貪腐的事實下台。七一五學者的發言中，特別指出陳水扁為自己所做的辯護站不住腳。陳水扁說，國務機要費的制度是國民黨時代遺留下來的，為什麼國民黨時代可以做，民進黨時代就不能做？針對這種似是而非的遁詞，七一五學者強調，民進黨如果代表的是民主政府，就有義務主動改革這種違反民主倫理的制度，而不是便宜行事，這嚴重喪失了轉型正義的原則。

七一五學者以轉型正義的精神譴責陳水扁與第一家庭的貪腐，未料陳水扁順水推舟，把轉型正義的標籤做為護身符。自二〇〇六年以後，陳水扁政府開始擴大使用轉型正義一詞，集中針對「國民黨黨產」與「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兇」兩大議題，聲討國民黨統治是不正義的。原來處於劣勢的陳水扁，在濫用、誤用轉型正義原則之下，一夜之間敗部復活，對國民黨歷史進行毫不懈怠的攻擊。陳水扁使用的策略，便是以主動出擊來自我防衛。這種策略證明是成功的，至少國民黨被迫必須在陳水扁所設下的兩大



議題展開攻防戰。近兩年來，綠色貪腐事件已完全轉移到國民黨的歷史事件之上。事實顯示，國民黨上下幾乎耗盡全部聰明才智，為歷史上的黨產問題與蔣介石的問題揮汗辯護，反而失去了對綠色貪腐抨擊的力道。

國民黨黨產與蔣介石地位，在正常的民主社會原就屬於公開的議題。在追求公平正義的過程中，這兩大議題終究必須拿出來檢討，而不是掩蓋起來不聞不問。不過，奢談轉型正義的陳水扁政府，卻在施政錯誤連連，以及貪腐事件不斷曝光的情況下，才開始對國民黨清算舊帳，這種手段是屬於政治上的報復，與轉型正義毫不相涉。

民選的總統並不等於正義使者，即使他以選票取代既有的威權體制。轉型正義的基礎，在於具有民主理想與抱負的總統，必須優先著手於政治改革。所謂政治改革，並非是把過去的政府視為一無是處，而應該是對舊有的政治事實進行批判性的接受。凡屬於腐敗的，必須草除；凡屬於健康的，則應予以發揚延續。因此，從事政治改革並不是完全否定過去的政府，而是循序漸進以和平方式穩定轉換。尤其是以民主方式取得政權的陳水扁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延續國民黨未完成的改革。

台灣的歷史轉型，全然不是經過革命手段完成的。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從蔣經國到李登輝，以至從李登輝到陳水扁，每一位領導者都是在前人未完成的政治改革基礎上進行下一波的施政。沒有李登輝的改革，就沒有陳水扁的順利接班。這種歷史事實不應該

輕易否定。

陳水扁所相信的轉型正義，完全蔑視台灣歷史的緩慢改革傳統。每當提到轉型正義時，陳水扁就以革命者自居，完全忘記自己是改革者的身分。全盤否定台灣歷史的演變，就沒有資格討論正義，甚至違背正義的原則。

就國務機要費事件而言，陳水扁享受了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錯誤制度。如果沒有遭到揭發，陳水扁是不可能主動改革這個制度。在前人錯誤的基礎上繼續製造錯誤，如何還有立場奢談正義？如果以「國民黨能，民進黨為何不能」做為自我辯護，如何還有立場高舉轉型正義的旗幟？

## 轉型正義是爲了使族群和解

「革命者」陳水扁在賤踏正義之後，卻又以正義使者自居，更是嚴重違背正義的原則。這兩年來，陳水扁政府以本土政權的假名，對於任何一位批評者動輒冠以「統派」帽子，這種粗暴的言論不僅不符轉型正義原則，甚至違背了基本人權的精神。

提出國民黨黨產與蔣介石地位的議題，如果是為了追求轉型正義，應該是在二〇〇〇年上任之初就公開討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重大問題，絕對不能夠使用粗暴、專斷、



蠻橫的方式來處理。由於這些議題涉及歷史記憶與族群情感的問題，就民主原則來看，必須是透過公聽會或公開辯論，使社會每一分子慢慢取得共識，然後以和平方式予以解決。

陳水扁政府在處理歷史問題，竟是以個人意志強行主導。每次討論歷史問題時，都選擇在重大選舉之前提出。因此，以換取選票方式主張轉型正義，這種做法絕對不是正義。所謂正義，不應該存有任何功利思考，不應該暗藏政治謀略，更不應該滲透任何分化撕裂的手段。正義，是為了使錯誤得到糾正，是為了使社會得到祥和，也是為了使政治臻於穩定。但是，從這兩年來的作為來看，轉型正義提出之後，歷史錯誤沒有得到糾正，社會也未趨於祥和，政治更是陷於動盪不安。這種轉型正義，既不正義，也不道德。

歷史問題是經過長期的累積，所以處理的過程就不能不謹慎思考。台灣歷史的轉型由於太過冗長，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也創造了不同族群的不同記憶。這些不同的記憶構成台灣族群文化的特質。在民主時代，對於族群間記憶的差異，必須培養出一種相互尊重的氣質。任何的蔑視與貶抑，都有可能製造族群之間的緊張。每一個族群都受到歷史的侷限，因此就產生不同的記憶。以蔣介石的記憶為例，有些記憶認為他是二二八事件元兇，有些記憶則認為他是建設台灣的領導者。對於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既不能輕率肯



定，當然也不能全盤否定。例如鄧小平就是以三七分的比例，來看待毛澤東的功過。這種處理歷史的方式，是較為合乎人性的。

陳水扁政府在主張轉型正義時，個人意志往往凌駕族群記憶之上，而他的個人意志又多出於自私的動機。如果他沒有貪腐事件纏身，則轉型正義的提法絕對不可能如此躁進而焦慮。如果他八年來的政績獲得國人的首肯，則轉型正義的討論必然是和平而圓融。然而不然，陳水扁既無政績於先，又無私德於後，遂濫用轉型正義的口號，對蔣介石進行空前未有的瘋狂批鬥。他的每一個攻擊動作，都是為了轉移國人對他個人的觀感。他的每一個抨擊發言，都是為了折算選票。轉型正義的精神一旦被扭曲，台灣的族群文化就無可避免淪為陪葬的祭品。

前總統李登輝說，選錯人，我們都受到懲罰。這種令人痛徹心肺的語言，道出了國人受到懲罰的滋味。台灣歷史的轉型其實沒有完成，只不過威權的強人換來一位不尊重民主的強人。轉型正義可能還要等待一段漫長的時間，才能回歸到它原來的精神面貌。